

中国的城乡移民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赵 忠^{*}

摘 要 本文综述了中国农村到城镇迁移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综述主要的关注点有四个：(1) 城乡分割和移民的演化；(2) 对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解释；(3) 迁移与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柔性 and 工资差距；(4) 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移民，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

一、绪 论

自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农村向城镇迁移（以下简称城乡迁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且吸引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问题，不断增长的文献中包括了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政府资助的研究报告，如张小建和周其仁（1999），相关的研讨会论文集，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2000）；社会学家的长篇研究报告，如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人口学家的研究，如李玉江、程道平和包玉香（1999）；当然还有经济学家的成果，如 West 和 Zhao（2000）。

迁移在经济学研究中并非一个新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 Todaro 模型（Todaro，1969）及其扩展形式——Harris-Todaro 两部门模型（Harris 和 Todaro，1970）。这个模型特别考虑了城市和农村一直存在的工资差距，在这一模型中，个人依据她/他期望的城乡收入差距来做出迁移的决策。Harris-Todaro 模型的预测结果受到了经验分析证据的挑战；并且经济学家认识到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参见 Nabi（1984）以及 Rosenzweig 和 Stark（1989）。至于迁移理论的发展变化和全球范围的实证结果，请参阅 Williamson（1988）这一优秀的综述文章。然而，中国独特的户籍（户口）制度，使得中国的迁移与其他国家的迁移有很大区别。

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很窄的话题，作者将评论经济学家对于中国迁移问题的主要研究，特别是对城乡迁移的研究。在这方面，研究文献已经有了较多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者通信地址：中国北京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电话：(010) 62758915；E-mail: zzhao @ccer.pku.edu.cn；传真：(010) 62751474。作者感谢世界银行的资助，Xiao-qing Yu 卓有见地的评论和万定山与何英华的助研工作。本文的所有观点和错误由作者负责，与世界银行无关。本论文的英文文本可向作者索取。

的积累。本文关注于城乡迁移,这是因为城乡迁移是中国国内迁移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其次是城镇到城镇迁移和农村到农村迁移),同时也是因为对其他几种形式的实证研究仍然非常有限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涵盖这一领域的所有研究论文。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简要介绍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并着重讨论了户籍(户口)制度。本部分还具体列举了自1978年以来城乡迁移政策的演变。第三部分对现有解释迁移行为的研究作了综述和评论,并且重点讨论了对迁移原因的共识和分歧;研究中的数据问题和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也在这部分作了探讨。第四部分是关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演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这部分总结和讨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市场柔性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对全文作了简要总结。

二、城乡分割和迁移政策的起源与演变

(一) 户口制度的起源

现行的户口制度起源于1951年,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并非用于控制人口流动。1955年,政府建立了长期性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即使在那时,也只有地主和假释的罪犯变更居住地时需要登记(Zhao, 2000)。一般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和造成至少三千万人丧生的大饥荒之后,政府开始加强户口管制,并且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包括城乡迁移。对于这样的政府行为,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理由是食物的匮乏,如Wu(1994)以及Zhao(2000)。但是,如果政府把农民看做是其扭曲的宏观政策(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辅助资源,正如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所论证的,那么不管食物是否充足,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政府需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使他们为工业部门提供廉价的农产品。在这种意义上,城乡分割存在着比食品匮乏更深刻的原因。

(二) 1978年前的户口制度

控制城乡迁移的手段是全方位的,其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口制度是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收入依赖于他们在集体农活中的日常参与;也就是说,每个农民成为一个集体生产队的一员,因此迁移的机会成本变得非常高。通过户口制度,政府在城镇分配工作和住房、配给食品

¹ 其中有几个特例,如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研究了政府计划内迁移, Ma(2000)和 Yao(2001a)研究了农村对农村的迁移。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样的政策下，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几乎不可能在城镇地区生活下去（参阅 Zhao, 1999 以及 Cai, 2001）。

这些手段确实非常有效。从 1949 年到 1985 年，中国的平均迁移率仅为 0.24，²而 1950 年到 1990 年世界平均迁移率为 1.84，参见 Zhao (2000)。Zhao (2000) 指出，改革之前存在三条基本的城乡迁移途径。第一是家庭团聚，如与配偶或父母团聚；其二是城镇单位的招工；最后是考上大学或者参军。然而，通过这三条途径迁移是极其困难的。

户口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 Wu (1994) 的研究，1949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 11.7%，到 1960 年增至 19.3%。这个时期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由大跃进引起的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化水平下降了，在 1978 年之前，一直维持在 14.5% 左右的水平。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化水平的下降主要是户口管制加强的结果；另外还有两项措施也加剧了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其一，在大饥荒之后，政府将之前受雇于城镇部门的二千多万农村居民送回了农村（Zhao, 2000）；其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许多学生送到农村接收“再教育”。对于第二项措施的意义和重要性，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

（三）1979 年后户口制度的演变

由于户口制度，城乡迁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需要注意到，户口制度也同样严格限制农村到农村、城镇到城镇的迁移。这一制度同时剥夺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迁徙自由。³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责任制产生并最后代替了集体生产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家庭责任制将一些个人自由交还给了农村居民（Zhao, 1999a），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 1978 到 1984 年间，这一新制度可以解释农业总产出增长率（42.23%）的一半左右（Lin, 1992）。生产率的增长使得城镇自由市场的食品大大充足，最终导致食品配给制度的取消（Zhao, 1999a）；同时，这也产生了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由于以上几点，城乡迁移变成了可能的行为。

在城镇地区，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发展，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城镇就业政策的放松，这些都产生了对移民的需求（Meng 和 Zhang, 2001；Cai, 2001）。同时，发展战略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城镇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城乡移民，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

² 迁移率定义为农村到城镇的净迁移除以基期农村人口总数。

³ 人民公社制度和土地国有制使得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几乎不可能；食品配给、住房及工作分配与当地户口挂钩阻碍了城镇到城镇的迁移。

现象。但对于移民的准确数量，人们存在一些分歧（可参阅 Rozelle 等，1999）。Zhao 和 Sicular（2002）所引述的数据表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城乡移民的数量翻了一番——1989 年移民数量为 890 万，到 1994 年数量增至 2300 万人；更详细的移民数据请参见表 1。王桂新（2000）关于地区间迁移的研究也确认了这一点，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1 中国的农村人口、劳动力数量和移民数量(单位：千人)

年份	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比	农村劳动力数量	乡镇企业雇佣人数	农村移民
1978	790140	82.08	306380	28270	
1980	795650	80.61	318357	30000	
1985	807570	76.29	370651	69790	
1989					8875
1990	841380	73.59	420095	92650	
1991	846200	73.06	430925	96090	
1992	849960	72.54	438016	106250	13785
1993	853440	72.01	442557	123450	
1994	856810	71.49	446541	120170	22961
1995	859470	70.96	450418	128620	24488
1996	850850	69.52	452880	135080	25190
1997	841770	68.09	459617	130500	24763
1998	831530	66.65	464323	125370	26666
1999	820380	65.22	468965	127040	
2000	808370	63.78	479621	128200	
2001	795630	62.34	482289	13086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2)表 4-1,表 5-4,表 12-3;Sicular 和 Zhao（2002）,表 2.3。

表 2 1982 至 1995 年间中国的地区间迁移(单位：千人)

	1982—1987			1985—1990			1995—200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	—	—	—	—	—	—	—	—
中部地区	735 *	—	—	1089.4	—	—	2499.3	33.8	—
西部地区	379.2	60.5	—	843.7	222.6	—	1194.8	—	—

数据来源：王桂新(2000) ,表 1。

* 表中数据,如 735 ,表示从中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地区的移民数量为 73.5 万人。

尽管已有了上述的种种变化，但是基本的户口制度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一些省份和城市正着手改革户口制度，然而对于迁移官方的限制依然存在。1982 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⁴，根据这一办法，

⁴ 这一规定在 2003 年 8 月 1 日被废除。

各大城市制订了各自的实施细则。在这些具体的实施细则中，经常将收容遣送的对象从流浪、乞讨人员扩展到“三无”人员⁵。在这些规定的名义下，警察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经常滥用职权，而移民则是受其侵害的最主要的对象。在媒体上，由于警察滥用职权而造成的死亡事件也时有所闻⁶。

(四) 1979 至 2000 年间迁移政策的演变

Huang 和 Pieke (2003) 以及宋洪远将 1979 之后的迁移政策演变划分为 4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79 至 1983 年，在这一时期，政府依然禁止迁移行为。第二个时期是 1984 至 1988 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基础上进入城镇。第三个时期是 1989 至 1991 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移民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因此也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但在 1989 年春节期间，出现了大批农村移民——“民工潮”一词也由此而来。当年的“民工潮”之后，政府感觉到有必要对迁移进行干预和限制。第四个时期是 1992 至 2000 年，在这一时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城乡迁移。但在 1995 年之后，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下岗工人，严重的就业问题使得当地政府加强了对迁移的控制。

以北京为例，蔡昉、都阳和王美艳 (2001) 列举了城乡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演变。这些政策反映了在这个时期北京的宏观政策。如表 3 所示，1989 年以后，北京的迁移政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 1989 至 1991 年，北京市政府对被描述成“盲流”的移民进行规范和限制。1992 至 1994 年，北京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城乡移民；政策宽松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城镇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巨大。从 1995 年开始，下岗职工成为城镇地区的一个社会问题；北京市政府重新加强了对迁移的控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将更多的工作岗位留给城镇居民。其他许多城市也经历了与北京类似的几个阶段。

除了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城镇普通居民也对移民存有敌意，并且不愿意与农村居民一起分享城镇较高的生活水平 (Zhao, 1999a)。新闻媒体经常不公平地“把移民与拥挤、混乱、犯罪、暴力、超生和非法性关系等，联系在一起” (Davin, 2000)。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仍需要长期努力。

⁵ 三无的一种解释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合法收入来源；另一种解释是：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就业证。

⁶ 孙志刚死亡事件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表 3 北京市对于农村到城镇移民的歧视政策

时期	控制数量	证件、收费管理	审批和管理程序	限制行业工种
规范限制时期 (1989—1991)	招收临时工必须具备本地城市户口;清理、压缩 20—25 万外地农民工;严格控制招用农村劳动力	用人单位要为雇佣人员申领《暂住证》和《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		
政策宽松时期 (1992—1994)		停止向外地保姆收取管理费	建立健全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劳务合同;下放招用本市农村劳动力部分审批权限;下放使用外地务工人员部分权力	
严格控制时期 (1995—2000)	严格控制下岗待工人员较为集中系统使用外地务工人员数量;下岗待工人员达到 10 % 的企业,原则上不准招用外地务工人员;规定招用下岗职工和外地务工人员比例;对“限制”和“调剂”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和工种如何招用下岗职工和外地务工人员做了规定;对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实行总量控制	务工经商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和《外地来京人员就业证》,《就业证》为“证卡合一”;从事家庭服务的外来人员必须办理《北京市外来人员家庭服务员证》;规范办理《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的程序;根据来京时间、从业状况、现实表现等,为外来人口发放 A、B、C 三种新型暂住证	规范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程序;加强外地来京人员管理、收容遣送“三无”人员;对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从事一些特殊行业的条件做出了严格规定	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工种从 1996 年的 14 个增加到 1997 年的 32 个,1997 年还规定商业企业不得招用外来人员从事营业员工作;1998 年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工种增长到 34 个;1999 年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共计 8 个,职业共计 4 个大类,12 个中类,35 个小类,103 个细类

资料来源:此表原为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中的表 4。

(五) 2000 年后的户口制度改革

2000 年后,政府一直在改革户口制度,并且允许更高的人口流动性。2003 年 8 月 1 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是公众、特别是移民群体的一个重大胜利。

2002 年 2 月 25 日,在公安部所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鲍遂献回顾了户口制度的演变历程,并且说明了户口改革的方向(新华社,2002)。他指出,中国不会取消户口制度,但是会改革这一制度,并且放松对迁移的管制。实际上,一些省份,如吉林、湖南、福建、辽宁和广东省,在 2001 年底已经取消了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也在 2001 年展开(试点改革从 1997 年就已经开始)。在这些小城镇(县级镇或者以下),发放城镇户口的标准是:(1)拥有固定住所;(2)有工作;(3)

有合法收入。据称，大多数符合上述标准的户口申请者得到了当地户口。这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一做法从小城镇扩展至全国各地。

三、城乡迁移的原因

(一) 关于迁移的理论

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常被看做是主要的推力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成长中的工业联合体（*growing modern industrial complex*）”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是主要的拉力因素（Williamson, 1988）。但是，发展中国家关于失业率和失业问题的统计数据否定了这一论断。Todaro（1969）以及Harris和Todaro（1970）承认了城镇地区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进而提出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距是主要的拉力因素。

(二) 中国的实证结果

从表4可看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非常显著。198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09倍（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或者是2.50倍（Johnson, 2002）。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的研究中包括了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缩小，并且在1985年达到最低；当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26（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或者1.86（Johnson, 2002）。但自那以后，收入差距再一次扩大，使收入差距成V形。Yang和Zhou（1999）认为较早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在1978至1985年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而1985年之后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政府有利于城镇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引起。迁移不仅受到城乡收入差距驱使，也受到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表2可看出，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是从低收入的中西部地区迁移到高收入的东部地区。

除了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之外，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规模等因素）对于迁移的作用也是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这些因素在文献中得到了严谨的研究。

关于城乡移民决定因素的研究，目前已有较多文献；表5选录了代表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分析的主要自变量是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人均耕地、人均生产性资产、城乡收入差距等。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微观个人层面的分析，少数是基于家庭的分析。风险对移民的影响（Jalan和Ravallion, 2000），以及移民网络对迁移的影响（Zhao, 2001）也得到了深入研究。除了

蔡昉 (1996), 其他研究的研究数据都不是全国范围的样本, 而只是一个或几个省 (或者是县) 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研究中一般应用的是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元选择模型;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其他的计量经济学工具, 如 Hare (1999) 应用了持续时间分析 (duration analysis), Jalan 和 Ravallion (2000) 采用了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Yao (2001b) 使用了 tobit 模型 (tobit model)。

表 4 城镇收入与农村收入比率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 (1994) *		Johnson (2002) **
1978		2.57
1979		2.42
1980	3.09	2.50
1981	3.02	2.24
1982	2.74	1.98
1983	2.44	1.85
1984	2.39	1.86
1985	2.26	1.86
1986	2.60	2.12
1987	2.64	2.17
1988	2.49	2.17
1989	2.73	2.29
1990	2.84	2.20
1991	2.92	2.40
1992	3.05	2.58
1993	3.27	2.80
1994		2.86
1995		2.71
1996		2.51
1997		2.47
1998		2.51
1999		2.65
2000		2.79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 (1994) ,表 2。

** 资料来源:Johnson (2002) ,表 2。

表 5 关于中国农村到城镇移民决定因素的研究

研究	因变量	主要自变量	主要自变量的 计量结果	使用的数据和 计量经济方法
蔡昉 (1996)	农村移民与 农村非移民 之比	本地农村收入与全国平均农村 收入之比;本地农村人口比例 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比率; 本地人均耕地与全国人均耕地 之比;本地受雇于乡镇企业的 农民比例与全国这一比例的比 率	增加收入会减少迁 移;农村人口比例、人 均耕地、受雇于乡镇 企业的农民比例,三 者对迁移都有正的影 响	1990 年人口普 查数据 一般最小二乘法 (OLS)

续表

研究	因变量	主要自变量	主要自变量的 计量结果	使用的数据和 计量经济方法
Zhao (1997a)	离散变量：本地农业工作、本地非农业工作、迁移	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前子女数量，人均耕地，教育程度	女性使迁移概率减少 7 %；结婚使迁移概率减少 2.8 %；教育程度的升高提高了迁移的概率，但是对从事本地非农工作的概率提高更多；人均耕地对迁移有负的影响	农业部发展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统计局 1996 年在四川的联合调查数据 多元 Logit 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Hare (1999)	迁出移民的状态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人均生产性资产，人均耕地，家庭女性劳动者比例，家庭男性劳动者比例	男性使迁移概率增加 30 %；年轻人更倾向于迁移；结婚使迁移概率减少 10 %；教育程度、人均生产性资产和人均耕地对迁移的作用不显著	数据由作者和赵树凯于 1995 年在河南省夏邑县调查而得。 Probit 模型 (Probit Model)
Hare (1999)	迁移的时间长度 (spell)	性别，人均生产性资产，人均耕地，家庭女性劳动者比例，家庭男性劳动者比例	增加一亩耕地减少迁移时间的 27 %；人均生产性资产的作用为负；家庭女性劳动者比例和家庭男性劳动者比例都有正影响	数据由作者和赵树凯于 1995 年在河南省夏邑县调查而得。 持续时间分析 (Duration Analysis)
Zhao (1999a)	迁移状态	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年龄平方，人均耕地，教育程度	与平均相比女性迁移概率低 55.3 %，已婚者迁移概率低 37.6 %；年轻人、男性、未婚者更倾向于迁移；人均耕地的影响为负；教育程度对男性迁移有正的影响	1995 年和 1996 年在四川省的调查。 Logit 模型 (Logit Model)
Zhao (1999b)	迁移状态	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耕地面积	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和家庭耕地面积的影响为负；家庭劳动力数量有正的影响	1994 年和 1995 年在四川省的调查。 Logit 模型 (Logit Model)
Jalan 和 Ravallion (2000)	在镇外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比例	收入风险，农作物收成风险，健康风险	收入风险对迁移有显著的负作用；农作物收成风险对迁移没有作用；健康风险对迁移有很小的正向影响	1885 至 1990 年国家统计局广东省农村家庭调查的面板数据 (Panel data) 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Zhao (2001)	迁移状态	老移民数量，回迁移民数量，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	老移民数量和回迁移民数量代表迁移网络，对迁移的概率有正的影响	1999 年农业部发展研究中心在浙江、安徽、湖南、河北、山西和四川六个省的调查数据 Logit 模型 (Logit Model)
Zhu (2002)	迁移状态	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婚姻状况，城乡收入差距	年龄的影响为正，年龄平方的影响为负；教育程度仅对男性有正的作用，对女性没有影响；结婚显著地减少迁移概率；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家庭耕地面积对迁移有负作用	作者 1993 年在湖北省的调查 转换回归 (Switching Regression) 结构性 Probit 模型 (Structural Probit Model)

为了研究过剩劳动力对于城乡迁移的影响,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使用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蔡昉 (1996) 发现本地农村人口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比率、本地人均耕地与全国人均耕地之比、本地受雇于乡镇企业的农民比例与全国这一比例的比率,三者对迁移都有正的影响。人均 (或者户均) 耕地经常被看做是过剩劳动力的代理变量 (proxy variable)。赵耀辉 (1997a)、Zhao (1999a, 1999b), Zhu (2002) 的研究表明,耕地面积对于迁移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如果研究是在个人层面的,增加一亩耕地可以减少 4.4 % 的迁移概率 (Zhao, 1999a); 如果研究是在家庭层面的,增加一亩耕地可以减少 2.8 % 的迁移概率 (Zhao, 1999b); 而 Hare (1999) 发现,在家庭层面上,耕地面积对于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增加一亩耕地可以缩短 27 % 的迁移持续时间 (the migration spell)。

为了研究收入差距对于迁移的影响, Zhu (2002) 构造了一个模型,并且发现收入差距是最重要的正向因素。蔡昉 (1996) 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发现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迁移。在家庭层面上, Hare (1999) 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 100 元可以使迁移持续时间增加 2 %。这些发现与 Harris-Todaro 两部门模型一致。然而,还没有研究回答 V 形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迁移趋势的影响。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还太少。

Zhu (2002) 研究发现,年龄与迁移概率的关系是倒 U 形的。Hare (1999) 发现 16—25 岁和 26—35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迁移。Zhao (1999a) 研究表明迁移概率随年龄递减,因为年龄大的人迁移时产生的心理成本较大 (Zhao, 1997a)。在文献中,年龄对于迁移的负作用的原因,主要被解释为年长者从迁移中受益的时间较短; 但是在中国,由于很多移民都是暂时性的,因此这一解释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Zhao, 1999a)。但是, Zhao (1997b) 又发现了年龄对于迁移决策的正向影响; 她推测这是因为年轻人的迁移选择受到严重的制约,虽然他们愿意迁移,但是迁移的机会其实很少。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对教育对于迁移的作用的认识是不一致的。Zhao 发现正规教育对于迁移只有很小的影响 (这很让人意外),但是教育对于个人从农业工作转到非农业工作有显著的正影响 (Zhao, 1999a); 很多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更喜欢从事本地非农业工作,而不是迁移后找到的工作 (赵耀辉, 1997a)。Hare (1999) 也发现正规教育对迁移概率没有影响。通过一个家庭层面的模型, Zhao (1999b) 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于迁移有显著的负作用。Zhu (2002) 发现教育仅对男性有正影响,但对女性没有影响。对于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二元选择模型 (两个选择是迁移和不迁移) 与三元选择模型 (三个选择是农业工作,非农工作和迁移后的工作) 两者估计的结果很难比较。赵耀辉

(1997a) 和 Zhao (1999a) 的研究中所用的多元 logit 模型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农业工作和非农工作存在很大的区别。将这两个选择混合到一起, 可能会混淆一些变量的作用。另一个解释是教育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Zhu, 2002), 因此按照性别分组来估计教育的作用可能会更好。

性别是决定迁移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女性通常比男性更不倾向于迁移。赵耀辉 (1997a) 发现女性可减少 7 % 的迁移概率; 而 Hare (1999) 发现男性可以增加 30 % 的迁移概率; Zhao (1999a) 研究表明, 女性的迁移概率要比男性的低 55.3 %。这些研究反映了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主要的是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婚姻状况是迁移决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已婚状态可减少迁移概率的程度为 2.8 % (赵耀辉, 1997a) 到 10 % (Hare, 1999)。Zhao (1999a) 研究发现, 已婚的人要比一般人的迁移概率少 37.6 %。Zhu (2002) 也发现了婚姻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已婚的人, 迁移成本 (包括货币成本和生理成本) 要高一些。

经济学家还研究了迁移决策的其他一些方面。Jalan 和 Ravallion (2000) 发现了收入风险对于迁移决策的显著负作用, 但发现农作物收成风险、健康风险对迁移没有影响。Zhao (2001) 研究表明移民网络对于迁移概率有正的影响。

关于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 很多都利用离散选择模型。Hare (1999) 和 Yao (2001b) 是两个例外。利用持续时间分析 (duration analysis), Hare (1999) 研究了迁移的时间长度 (the spell of migration)。她的主要发现是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亩, 迁移的时间长度减少 27 %; 人均生产性资产对迁移有负作用; 家庭男性劳动者比例和家庭女性劳动者比例都有正的影响。她的研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个人特征对于迁移决策更重要, 而家庭层面的变量对迁移持续时间的长短更重要。家庭特征以及个人特征与中断迁移的概率 (exit probability) 之间的关系也是个有意义的课题, 但很遗憾, 作者对此没有进行分析和估计。

Yao (2001b) 也研究了迁移持续时间长度, 他所关注的是土地分配与迁移的关系。他在研究时没有应用持续时间分析, 而用了 tobit 模型。因此, Yao (2001b) 的估计结果与 Hare (1999) 的结果是不同并且无法比较的。Yao (2001b) 的主要结论是, 平均分配土地激励了劳动力的移民。作者没有提供一个 McDonald-Moffitt 分解 (McDonald 和 Moffitt, 1980), 因此我们无法衡量土地分配对于迁移的深度效应 (intensive contribution) (即移民的迁移持续时间的变化) 和广度效应 (extensive contribution) (即人群参与到迁移中的比例的变化), 而这些效应对于政策分析是很重要的。

(三) 共识以及遗留的问题

过剩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迁移背后的推动力量, 总的来说,

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迁移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在研究结果中,教育对于迁移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风险和移民网络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深入研究。

但是,直接研究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迁移的决定作用的论文现在还太少。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农村过剩劳动力到底有多少。另外,关于迁移的数据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Sicular 和 Zhao, 2002)。目前研究中,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地区数据而非全国性的数据,这限制了估计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external validity)。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工资差距

在这部分中,我将讨论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market segregation)、工资决定 (wage determination)、工资差距 (wage differentials) 和市场柔性 (market flexibility)。表 6 选录了有代表性的成果。

表 6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决定和工资差距的相关研究选录

研究	研究的主题	主要结论	使用的数据和 计量经济方法
Zhao (1999a)	农村家庭收入	一个农业从业者转而从事迁移后的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 49.1%;一个农业从业者转而从事本地非农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 13.0%;增加一个农业从业者,可以使家庭收入增加 9.0%;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非常小	1995 年和 1996 年在四川省的调查; 一般最小二乘法 (OLS)
Yao (2001a)	本地居民和移民的工资差距	本地居民和移民的工资存在 135% 的差距,可观察的变量可以解释这些差距的绝大部分;对于本地工人,工资主要由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决定;而对于移民,工资主要决定于年龄、教育程度和从事现有工作的时间	对中国四个村庄(分别属于不同的四个省份)的调查数据; 一般最小二乘法 (OLS)
Meng 和 Zhang (2001)	农村移民和城镇居民的职业状况 (分为四类:白领职工,批发零售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生产及其他从业人员)	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更有可能拥有一个白领工作或者批发零售工作;对于农村移民,教育水平提高了他们得到白领工作的机会,但是减少了他们从事批发零售工作的概率;另外,家庭结构对于城镇居民的职业状况无关紧要,但对农村移民的职业状况至关重要	1995 年和 1996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做的《上海流动人口调查》和《上海居民和流动人口调查》; 多元 Logit 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eng 和 Zhang (2001)	农村移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农村移民的教育回报比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高;职业培训对城镇居民很重要,但对农村移民并不重要;婚姻状况与农村移民的收入正相关,但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无关 很大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职业内部未解释的部分,可能是歧视的结果	1995 年和 1996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做的《上海流动人口调查》和《上海居民和流动人口调查》; 一般最小二乘法 (OLS)

续表

研究	研究的主题	主要结论	使用的数据和 计量经济方法
Meng (2001)	移民的工作状况 (分为三类:正规 部门、非正规部门 的受雇者、非正规 部门自我雇佣)	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高素质的个人, 如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受过较多的培训 或者有更多的城市工作经验等,更有可 能在非正规部门自我雇佣。正规部门 和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存在差别, 但是很难确定哪一类人具有较高的市 场素质	1995 年在山东济南的 调查; 多元 Logit 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eng (2001)	正规部门、非正规 部门的受雇者、非 正规部门自我雇 佣,三者之间的工 资差距	教育对于正规部门不重要,但是对其他 两个部门很重要;农村工作经验对于正 规部门和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有 显著的正影响,但是仅有城市工作经验 对非正规部门的自我雇佣工资有影响; 培训对于三类工作都很重要;对于非正 规部门自我雇佣,性别和婚姻状况都不 重要 观察到的个人禀赋仅能够解释工资差 距中的很小一部分	1995 年在山东济南的 调查; 赫克曼两步法 (Heck- man Two-step Model)
Zhu (2002)	移民和农村非移 民的收入函数	年龄对收入有倒 U 形的影响;教育对 男性移民有正影响,但对女性移民没有 影响,并且对非移民的影响要大于对移 民的影响	作者于 1993 年灾湖北 省的调查; 纠正选择性偏差后的 Switching 回归 (Switch- ing Regression with Se- lection-Bias Correction)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

尽管经济改革已有二十多年，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分割状态。分割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虽然近年来农村到城镇的移民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制度性的迁移障碍仍然存在（参见蔡昉等，2001）。

另外，在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内部也存在着市场分割，比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这种分割的程度每个地区有所不同。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1998a，1998b，1998c）的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四川省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相对较高，广东省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研究还表明，在上海城镇地区，原来的城乡二元体系已经被农民工和城镇居民职工二元体系所代替。

Yang 和 Zhou (1999) 发现，城镇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之故。1992 年，国有工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是 9346 元、1211 元和 601 元。两位作者认为，城镇福利制度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是主要的制度

性障碍。另外儿童保育和教育的高昂成本阻止了农村家庭迁移到城镇地区。Zhao (1999a) 认为城镇地区的昂贵的住房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⁷。现存的这些障碍增加了迁移的成本, 减少了永久移民的数量; 实际上, 绝大部分的移民是暂时移民。

如果农村移民克服了上述迁移障碍, 他们又会马上面临其他各种歧视, 甚至被社会排斥在外 (Yao, 2001a), 而这些歧视比起前面的那些障碍来, 更加难以克服。社会对移民的排斥是全方位甚至骇人听闻的。移民通常在居住区域上被孤立, 在政治上被忽视, 在经济上受歧视 (参见 Yao, 2001a)。著名的“浙江村”——在北京的移民形成的一个小社区, 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

Meng 和 Zhang (2001) 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更有可能拥有一个白领工作或者批发零售工作。对于农村移民, 教育水平提高了他们得到白领工作的机会, 但是减少了他们从事批发零售工作的概率。在职业组成上, 只有 1 % 的移民为管理或技术人员, 而有 19 % 的非移民从事这些工作 (参见 Knight, Song 和 Jia, 1999)。在控制个人特征后, 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要比本地居民低 17.6 % (Yao, 2001a)。

Knight, Song 和 Jia (1999) 发现, 在城镇企业中, 城镇劳动者和农村移民劳动者替代程度不高。他们的调查发现, 吃苦耐劳和易于管理是移民最主要的两个优点。

Meng (2001) 仅对移民做了研究, 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高素质的个人, 如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受过较多的培训或者有更多的城市工作经验等, 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部门自我雇佣。正规部门和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存在差别, 但是很难确定哪一类人具有较高的市场素质。

(二) 工资差距

通过工资方程的估计, Meng 和 Zhang (2001) 发现农村移民的教育回报比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高 1 % 左右; 职业培训对城镇居民很重要, 但对农村移民并不重要; 婚姻状况与农村移民的收入正相关, 但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无关。移民和非移民的工资相差 50 %, 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歧视的结果。但是 Yao (2001a) 发现, 在本地居民和移民的 135 % 的工资差距中, 可观察到的变量 (企业性质、村庄和个人的特征等) 可以解释其中的绝大部分。对于一个本地职工, 工资主要由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决定; 而对于移民, 工资主要决定于年龄、教育程度和从事现有工作的时间长短。Meng 和 Zhang 与 Yao 的不同研究结果或许可以由 Rosen (1974) 的 Hedonic 模型解释——Rosen 的模型认为收入同时反映了个人特征和工作职位特性。Meng 和 Zhang (2001) 只控

⁷ 在北京, 一间一居的单元房月租金约为 1000 元左右, 而移民的平均月工资仅为 533 元 (Zhao, 1999a)。

制了个人特征，而 Yao (2001a) 对两者都进行了控制。

在中国，职业间和职业内部的歧视都存在，但 Meng 和 Zhang (2001) 认为职业内部的歧视更加严重。他们发现，城镇职工和农村移民职工之间小时工资差距的 82 % 可以由职业内部不平等的工资政策解释。

除了存在移民和非移民之间的工资差距，在中国还存在行业间的工资差距。Gordon 和 Li (1999) 从理论上分析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这类差距在移民中同样存在。教育对于在正规部门的移民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在非正规部门受雇或者自雇的人很重要；农村工作经验对于正规部门和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仅有城市工作经验对非正规部门的自我雇佣工资有影响；迁移前的培训对于三类工作都很重要；对于非正规部门自我雇佣，性别和婚姻状况都不重要 (Meng, 2001)。

Yao (1999b) 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他认为这个市场是非竞争和被分割的，并且引用了人力资本在工资决定中有限的作用来支持他的观点。Zhao (1999a) 发现农业工作、非农业工作和迁移后的工作的边际生产率差别很大。根据她的研究，如果一个农业从业者转而从事迁移后的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 49.1 %；一个农业从业者转而从事本地非农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 13.0 %；增加一个农业从业者，可以使家庭收入增加 9.0 %。与 Yao (1999b) 类似，Zhao (1999a) 也发现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非常小。

(三) 劳动力市场的柔性

柔性是相对于刚性 (rigidity) 的概念。由于户口制度，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政府保护，免受移民的竞争。绝大部分移民不得不受雇于非正规部门。Meng (2001) 发现，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更多，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更发达。这表明，在正规部门中，个人禀赋的市场价值较低。

然而，Gordon 和 Li (1999) 的理论模型预测，行业间的人口迁移将会迫使政府减少工资扭曲（以及工资刚性）。Dong 和 Bowles (2002) 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在四类所有制（国有制、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单位中，教育的回报率已经趋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不同行业间的要素流动必将使得不同行业的要素价格趋同。

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样也给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带来了压力。移民不断流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大量存在，私营部门和合资企业的竞争——这些必然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柔性。但是，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还不能够定量地确定城乡移民对于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贡献。

(四) 共识

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最主要的共识是，这一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有很多种类型：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镇和农村劳动力

市场内部的分割, 移民和非移民之间的分割, 移民内部的分割。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更多, 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更发达。迁移(城乡迁移和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柔性, 但是这一作用难以定量分析。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 批判

对中国迁移问题的研究, Zhu (2002) 有三点批评: 第一, 很多研究依然是定性研究; 第二, 现有的数据不适用于迁移问题研究; 第三,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移民和非移民的收入差距, 而忽视了劳动力流动性和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

对于第一点, 在上文可以看到, 目前已经有大量应用高级计量经济方法的研究。对于中文的相关文献, Zhu 的批评是适用的, 但是对于相关的英文文献, 他的批评是不当的。

对于 Zhu 的第二点批评, 我同意他的观点。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是绝大部分调查, 特别是全国性的调查, 并不适合应用于移民研究; 就算是最最近的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有这个问题; 其二是我在第三部分提到的, 很多研究利用了地区性数据——由于中国地区间差异巨大, 这产生了两个难题: 将估计结果应用于其他地区的有效性和各个研究之间的可比性都存在疑问。数据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问卷设计不当, 也是因为难以抽取一个代表性的移民样本和一个对应的非移民样本; 如果要长时间跟踪相同的样本点, 那更是难上加难。

目前, 中国政府正在改革户口制度, 设计一个调查, 以研究户口制度的影响, 现在正是好机会。

至于 Zhu 的第三点批评, 我同意劳动力流动和收入之间动态关系的重要性。从宏观角度看, 研究 V 形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迁移的影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是, 限于目前可得的数据, 要对这样的动态关系做实证研究是很困难的。表 5 中的一些研究揭示了收入和迁移之间的静态关系。

(二)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除了劳动力流动和收入之间动态关系, 下列问题也很重要, 并且很有意思。

第一, 迁移和劳动力市场演变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 迁移与城镇失业问题、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众所周知, 1995 年后, 很多大城市由于下岗工人大量出现, 加强了对迁移的控制。但是, 这一政策制定主要是根据“传闻”之类的证据, 并没有严谨的实证支持。类

似问题的实证研究，对于日后类似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

第二，迁移对移民家庭结构和子女福利的影响。第一次民工潮已经过去近20年，这一时间长度已经足够让我们来研究此类长期影响。

第三，永久移民和暂时移民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比较研究。目前社会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新闻媒体经常将城市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外来移民的暂时性或流动性；另一方面，政府和城镇大众几乎从未采取措施让移民永久安顿下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有很强的政策意义，特别是对于如何制定鼓励或限制迁移的政策。

第四，移民对于迁出地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几个相关研究：Taylor, Rozelle 和 de Brauw (2002) 研究了迁移对于迁出地收入的影响；Zhao (2002) 研究了回迁移民的行为；Bai (2000) 研究了迁移对农业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太少。

研究限制迁移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很有潜力的研究题目，如 Au 和 Henderson (2002) 对迁移限制与产业聚集和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少。从长期看，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有害，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很有帮助。

现有的研究回答了关于城乡移民的许多问题，但是还有更多的问题还没有答案，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Au, Chun-Chung and Henderson, V., "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8707.
- [2] Bai, Nansheng, "The 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Agriculture: An Empirical Study",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eds.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3]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 "上海: 城市职工与农村民工的分层与融合", 《改革》, 1998年第4期, 第99—110页。
- [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 "广东中山: 外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分析", 《改革》, 1998年第5期, 第64—73页。
- [5]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 "四川绵阳: 一个统一的、城乡通开的劳动力市场", 《改革》, 1998年第5期, 第74—83页。
- [6] 蔡昉, "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6年春季卷, 第120—135页。
- [7] Cai, Fa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Two Processe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9,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1.
- [8] 蔡昉、都阳、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经济研究》, 2001年第12期, 第41—49页。
- [9] 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 《农民流动与性别》,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0。

- [10] Davin, Dellia, "Migrants and the Media: Concerns about Rural Migration in the Chinese Press",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eds.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11] Dong, Xiao-yuan, Paul Bowles, "Segment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Emerging Industrial Labor Marke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170—196.
- [12] Gordon, Roger, and David D. Li, "The Effects of Wage Distor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163—183.
- [13] 国家统计局,《2001 年统计年鉴》,2002。
- [14]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研究”,《经济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34—45 页。
- [15] Hare, Denise, " '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5(3), 45—72.
- [16] Hare, Denise,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Location and Its Effect on Migrants' Wages: Evidences from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2, 50(3), 557—579.
- [17] Harris, John R., Michael P. Todaro,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
- [18] Huang, Ping, Frank N. Pieke, "China Migration Country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Poor Policy Choices in Asia, Dhaka, June 22—24, 2003.
- [19] Knight, John, Lina Song, and Huaibin Jia,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5(3), 73—104.
- [20] Jalan, Jyotsna, Martin Ravallion,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Risk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 [21] Johnson, D. Gale, "Can Agricultural Labour Adjustment Occur Primarily Through Creation of Rural Non-Farm Jobs in China", *Urban Studies*, 2002, 39(12), 2163—2174.
- [22]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高级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
- [23] 李玉江、程道平、包玉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动态预测与分析——以山东省为例”,《人口与经济》,1999 年第 3 期,第 41—46 页。
- [24] 黎强,“人口流动的生育后果及其控制”,《人口与经济》,1990 年第 4 期,第 7—12 页。
- [2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26] Lin, Justin,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 34—51.
- [27] Ma, Xiaodong, " 'Insider' and 'Outsider' Community Strategies toward Migrant Workers",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eds.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28] Meng, Xi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A Chinese Case Study",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1, 15(1), 71—89.
- [29] Meng, Xin, Junsen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 485—504.
- [30] McDonald, John, Robert Moffitt, "The Uses of Tobit Analysi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0, 62(2), 318—321.

- [31] Nabi, Ijaz, "Village-end Considerations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4, 14, 129—145.
- [32] Rosenzweig, Mark R., Oded Stark,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4), 905—926.
- [33] Rosen, Sherwin,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1), 34—55.
- [34] Rozelle, Scott, Li Guo, Minggao Shen, Amelia Hugart, John Giles,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No. 158, 367—393.
- [35] Sicular, Terry, Yaohui Zhao,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manuscript, 2002.
- [36] 宋洪远,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手稿。
- [37] Taylor, J. Edward, Scott Rozelle, Alan de Brauw,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forthcoming.
- [38] Todaro, Michael,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 138—148.
- [39] 王桂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 《人口与经济》, 2000年第3期, 第8—16页。
- [40] Wang, Tianhong, Atsushi Maruyama, Masao Kikuchi,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in a Northeastern Province",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38(1), 80—104.
- [41] Williamson, Jeffrey 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apter 11,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eds. Hollis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lsevier, 1988.
- [42] West, A. Loraine and Yaohui Zhao,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43] Wu, Harry Xiaoying,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 669—698.
- [44] "我国不会取消户籍管理制度", 新华社, 2002年2月25日。
- [45] Yao, Yang, "Rural Industry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ster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59(2), 463—496.
- [46] Yao, Yang, "Social Exclusion and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The Status of Migrations in China's Coastal Rural Area", Working paper E2001005,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01a.
- [47] Yao, Yang, "Egalitarian Land Distribu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E2001007,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01b.
- [48] Yang, Dennis Tao and Hao Zhou, "Rural-Urban Disparity and Sectoral Labour Allo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5(3), 105—133.
- [49] 张小建、周其仁,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9。
- [50]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研究》, 1997年第2期, 1997a, 第37—42页。
- [51] Zhao, Yaohui,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7b, 79, 1278—1287.
- [52] Zhao, Yaohui,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a, 47(4), 767—82, July.

- [53] Zhao, Yaohui,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b, 89(2), 281—286, May.
- [54] Zhao, Yaohui,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eds.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55] Zhao, Yaohui, "The Role of Migrants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Working paper, E2001012,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01.
- [56] Zhao, Yaohui,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376—396.
- [57] Zhu, Nong, "The Impact of Income C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213—230.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ZHONG ZHAO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economic studies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The review focuses on four issues: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segmentation and migration, explanations for rural-urban migr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evolutio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wage differentials, and lastl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JEL Classification J61, J68, J42